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0年 7期

要 目

- | | |
|------|----------------------|
| 月度论坛 | CCG:“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 |
| | 黄亚生:印度崛起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
| 中国模式 |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
| | 黄 靖:中国模式正受到挑战 |
| 金融危机 | 陈兴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五大担忧 |
| 经济转型 | 陈志武: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
| 人才竞争 | 张旭东:千人计划需吸纳文科领域高端人才 |
| 社会改革 | 李曙光:从“刀制”到“水治” |
| 住房问题 | 郑永年: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症结 |
| | 袁 岳:建议建设魅力青年廉租社区 |

www.ccg.org.cn

电话:010—64392122、64392123、64398745 传真:010—64398744 邮箱: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10年7期

主办单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志凯 汤敏 陶庆华 田溯宁
王波明 薛澜

执行主编

邓宗南

编辑

苗绿 常慧敏 封涛

编务

王颖 冯登宁 孙娜娜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宏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兴动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邓峰 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宁 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首代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山 三山公司合伙人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小加 香港证券交易中心总裁
李一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林达贤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刘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王永庆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
宋永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管理司司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谭天星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司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主席, 创办人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王文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周云帆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亚大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唯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易珉 GE公司环渤海区总经理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美国百人会会员
张亚勤 微软全球副总裁,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民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月度论坛

CCG 主办“中印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

自日本于二战之后重新崛起以来，中国与印度又相继腾飞，“亚洲崛起”和“世界中心”的东移，正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大格局最大变化之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之间无论是国情还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历程，既有可以导致在许多领域内竞争与比较不可避免的相似性，也有导致两个国家展开合作以及走向不同发展前景的重要区别，加上绕不开目前又无法协商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因此，“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比较，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仅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全球化世界，成为全球政、商、学各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会深刻影响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发展，成为各自不得不重视的研究课题。

为更好探讨中印之间的关系，比较“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长短异同，以便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获取更多借鉴，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在2010年1月21日于长安俱乐部举办了“大国崛起的龙象之争：中印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午餐会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主持，并邀请国际知名的相关研究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担任主讲嘉宾。

其他出席人员包括：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陶庆华，SOHO中国CEO张欣，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孙强华，万国集团董事长孙立哲，北大MBA美方院长杨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方源资本总裁唐葵，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中化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李雷，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Hay(合益)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玮，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黄伟东，北京绿创环保集团董事局主席姜鹏明，渔阳饭店总经理蒋大北，中国专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田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副总裁赵玉峰，达美航空中国区总经理Sandeep Bahl，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副代表邵丽，中国联合电力投资公司执行董事Eri Zhu，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政策分析官员Jonathan Fritz，无限广告执行总裁徐大庆，亨瑞国际咨询公司总裁Henry Zou，西安方元市场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庄元，IDC中国研究总监武连峰，北京国际汉语学院副院长

李劲松, King Hong Capital 董事总经理曾人雄, 万富春森林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CEO 程受珩, 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副代表邵丽,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产品总监邓适宜等 70 多位各界人士。

黄亚生教授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华裔学者之一, 先后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任教, 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 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同时也是复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 其最新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 2008 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他也是研究中国与印度的著名专家, 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 以便帮助中国与印度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黄亚生教授指出, 很多人去印度, 眼睛里常能看到的是脏乱差的印度, 就觉得印度落后于中国, 但这只是看到了硬件设施和基础建设, 而没有看到“软件”因素, 包括各种经济指标、政府与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眼睛看不到的竞争力。例如印度经济发展依靠内需为主要驱动力, 非常稳健, 第三产业也很发达, 而这正是现在中国经济转型所致力方向之一。因此, 尽管中印各自的发展模式并无高下之分, 但“印度模式”中也有许多为中国未来发展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黄亚生教授引用巴西过去的案例总结称, 从 1968 年到 1976 年, 巴西也有奇迹性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11%。但是, 经济效率与政治稳定等系列问题并没有在经济增长得到妥善的解决, 结果接下来就出现了 20 年的停滞不前, 十几年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这个模式能够长期可持续地成功。“中国模式”已经在过去三十年取得巨大的成功, 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修正。印度的崛起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既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种机遇。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也指出, 作为本世纪逐步走向“崛起”的两个未来的大国, 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人口最多, 经济总量大, 人均收入低, 经济快速增长, 财富收入两极分化严重; 同时也是世界上送出留学生最多、接受海外汇款最多、人才流失数量庞大的两个国家, 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成为了美国硅谷的重要力量。但是, 中国与印度也有着许多不同, 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 政府极富效率并且政治稳定。但是, 尽管大多数

舆论包括他自己都更为看好“中国龙”，这也不意味着“印度象”没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王辉耀主任总结“印度模式”对中国的启示称：其一，虽然印度每年引进的外资远远不如中国，但印度依靠内需为驱动的经济的发展更为稳健，而不易受外界影响，同时与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的模式，印度更重视经济体制包括金融的改革以及发展教育等社会因素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这对现今中国经济是个启示；其二，印度在高新产业的发展更注重知识与技术创新，这对中国欲从“山寨”跟风型的知识经济转型成为注重创新、创意的“中国创造”型经济也有借鉴意义；其三，在低端产业发展上，印度对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非常成功，这又归功于印度政府“国退民进”的放松管制以及鼓励私有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其四，印度重视社会投资的战略也值得中国学习，例如尽管“人多地少”、“人均收入低”的情况比中国更严重，但印度却能够给全民提供免费医疗，这并不是对财富二次分配全体国民采取平均主义，而是能者多得，同时也注意完善社会保障保证社会和谐；其五，印度对于人才的重视也值得参考，例如为了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国效力，印度2003年就改变国策开放双重国籍，并允许海外出生的印度裔申请。

此次午餐会为国内许多媒体所关注，《中国海归》主编陈海，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部门主任袁铁成，《中国经济周刊》主笔叶建国，《中国日报》记者司婷婷等媒体人士也参加了此次午餐会。这也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自去年举办“新加坡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千人计划建言献策”、“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等研讨会以及“国家形象论坛”以来，在2010年新年举办的第一次高端学术论坛。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还将于2月8日在长安俱乐部举办“内容为王，品牌为皇——中国媒体前景”午餐会，目前已确定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专门负责大中国区媒体及互联网行业投资推荐的季卫东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季卫东先生曾在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格林威治(Greenwich)媒体研究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获有iResearch“新经济最佳投资银行分析师”的称号，并被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和香港《南华早报》评为亚洲软件与服务产业第一的选股专家。目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已经成为国

内有关人才、留学、海归创业等研究方面的领先者，也是中国新兴而著名的全球化研究智库，其举办的高端论坛和圆桌研讨会已在国内外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印度崛起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

虽然，“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则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留在手里。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而且是有利于人民福利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微观的条件，有各个方面，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有政府管理的质量、政府自己受不受监督以及有没有节制等，这些都是微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制度方面的条件。在我看来，中印之间的比较，中国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经济体制；印度在哪一个方面都比中国差，除了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取决于制度条件

一般谈印度问题，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是它的劣势。很多国内记者也有谈到，一去印度就觉得又脏又差。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差的硬件环境，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现在能达到8%呢？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印度肯定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印度的劣势是很容易用眼睛看到，而它的优势是非常不容易看到的，它是一种隐性、无形的东西。虽然80年代去印度和现在去印度，从表面上来看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高速公路还是很差，等等。但是如果真正了解印度的经济变革，就会发现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可能取决于很多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取决于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管理、政府的管理等等这些不容易量化的“软件”。或者说，经济起飞取决于这个国家有良好的软

件设施。

中国目前的措施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要建更多的铁路、公路。而在在我看来，应该是先提高教育等软件设施的建设。先有软件设施方面优越的条件，才有经济发展的质量，有了经济发展和资源才去建设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印度的金融优势很大

印度经济的最大优势是金融优势。印度的发展跟中国的路径很不一样，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是外部推动的，当时发生的卢比危机，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金融危机。当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介入，要求印度进行金融改革，印度的步伐非常快，1992年已经开始银行的私有化了。很多人总是讲印度对外资限制，而中国对外资开放，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印度同时对内资开放，也对外资开放，而中国只对外资开放，对内资不开放，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区别在内资政策方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于印度10多年，而中国的金融改革却晚于印度10多年。印度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同时启动，而中国是经济改革在前、金融改革滞后。中国和印度各有领先的地方。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中国就业自由程度要超过印度。从员工的报酬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也优于印度。但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对于员工的培训，中国落后于印度；对于市场营销重视的程度，中国也落后于印度。

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

印度获得的外资相当于中国获得外资的10%，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外资在行业分布方面有巨大的不同。在中国，任何行业都有外资。外资的存在取决于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外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比较。如果本土企业非常具有竞争能力，那么本土企业应该输出资本，而不是进口资本。

而在印度，虽然获得的外资相当于中国的10%，但是每一分钱的外资都在高科技企业。通用电器在上海有一个研发部门，在印度也有一个研发部门，但在印度的研发部门在规模、运行等方面远远超过上海的研发部门。也就是说，印度的外资可能进入得少，但从行业分布来说是分布在相对劣势的高科技部门。印度在高科技方面虽然比较发达，但相对于美国企业、欧洲企业还是有劣势，所以该在这些方面吸收外资。

这说明，外资进入中国不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一种金融现象。中国

外资行业分布普遍，是金融失败的表现。如果银行体制更有效率，使我们自身能够获得资金，就不需要引进股本资金来发展生产了，股本资金是非常昂贵的资金，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每年8%、9%这么高的速度时，通过股本资金来融资是非常昂贵，贷款资金比较便宜。在经济发展这么快的时候，当民营企业不能获得贷款资金而选择引进外来股本资金筹资，这可能就是金融体制出现了问题。

◆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许多研究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研究，是必然的。当然，泛指“中国模式”还不只是经济模式，还可以细化为中国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中国模式”非常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政府主导型经济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

的经济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自动削弱了“看不见的手”。长期形成了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首先，国有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放贷可能产生坏账；其次，铁路、公路、基建等号称“铁公基”的基础设施已经日益过度，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此外，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趋势有所抬头，这样长期下来如何形成“内需经济”？实际上，中国经济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开放了民营经济，这也是中国模式能否取得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市场的力量会被限制，就会激发不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产业的商业模式……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也只是超级市场背后的工厂；中国第三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0%；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资源垄断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纯粹的民营企业上榜。中国还经常用“搞运动”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市场本能的创新活力无法充分激发，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遍及全世界的“中国制造”是相对低端的产品，没有“中国创造”的名牌，中国成为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而这种低成本加工国的地位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在不断减弱。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三十年来，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国面临是十年后“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因为“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另外，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和收入相对全球增长的快速上涨，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也会逐渐减弱。“人口红利”曾帮助“中国模式”完成了低端的发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未来会给“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

应该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打造创新型国家，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最核心的生产力已经不是工厂、设备、土地、以及能源，而是人才。我不久前出版《人才战争》一书，就指出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能否真正拥有大批高层次人才，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保证“中国模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民众心理问题

理论上，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比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导的社会更偏重效率

与公平。但前些年，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继续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再加上社会正义、教育、医疗、住房等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就会有国富民弱、内需无法增强、不得不依赖外需、处在产业链低端等系列恶性循环。另外，近年来因为腐败蔓延加深等问题，“民”对“官”缺乏信任感，而这在网络时代尤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不可否认是现有的“中国模式”所需要克服的另一面。

中国社会在取得物质的保障后，必将迎来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时代。过去的“中国模式”专注于集中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经济目标，个体在其中显得微不足道也易被忽视。在克服物质匮乏，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之后，“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将是如何分享物质。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入将是“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环境和能源问题

多年以来，“中国模式”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环境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的粗放式经营难以为继。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在2025年要达到减排40%-45%的标准，认真实施起来，对现有粗放式经营模式将会是巨大的挑战。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现有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过去三十年经济奇迹，却是一种处在比较低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进程中会十分有效。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模式需要做新的提升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包括进行社会 and 政策的创新。过去“中国模式”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不断地融入“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等在内的全人类好的经验和智慧，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或社会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必须学习“普世经验”和“普世价值观”。反之，要想让“中国模式”被世界认同和得到推广，也就是说自身能具有普世性，更必须不断开放和融合。

中国模式受到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靖

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有变化。中国经济上的成功,相当程度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GDP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年,这个比例突破35%,2007年为55.6%,去年高达57.3%。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长期停滞不前。虽然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但中国“实质就业市场”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1%。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但在社保、户口等却享受歧视性的“非正常国民待遇”;大学生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提高到45%以上。中国经过30

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不过，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但是，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国家干预应该集中在民生、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领域，对于市场经济则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和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70%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极其不匹配。

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比如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政治改革，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政治改革。所以说，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公平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这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努力。根

源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被许多强势团体所挟持。因此，中国需要进行系列的改革，例如完善民主社会，发展公民社会，增加非政府组织尤其能进行政策开发的智库的数量和质量，等等。尤其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必要的保证。当然，有些事情已经在政府主导下开始。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政府决策的更加科学化与民主化，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的政治民主与完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金融危机

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五大担忧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兴动

当前，从宏观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在加速。很多人把这次经济增长归功于这次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前的经济增长基础不牢，相关部分是宏观政策拉动的，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还需要调动民间经济的增长。而且由于没有及时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已经出现拐点，许多政策没有预见性，没有领先性，导致很被动。从现在来看，宏观刺激政策应该是过量的。当然，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球都没有对这个形势做出一个客观和正确、符合实际的一种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尽可能大的推动城市发展，推动服务业发展。但从短期来看，现在出台的政策有大概五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个担忧是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是全球性的，比如美国、欧洲，作为一个指标性的含义，增加了20个基点，但是未来要增长多少，因为利率往下降了，往上提多少，现在还说不出它已经从紧了。但是从G7国家来看，为时还太早，未来两三年可能都退不出，这个是外部因素，外

部因素导致全球流动性非常充裕，中国流动性更是充裕，所以现在应该管理流动性。

第二个担忧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货币多，一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中国目前则还是处在通缩的状态，如果通货膨胀管不好，它可能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不一定是CPI，可能表现在比如资产泡沫。

第三个担忧是银行不良贷款和坏账。

第四个担忧是可能会出现结构恶化。现在已经开始投资的，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还是在26%、27%以上。通过一两年以后，又可能出现产能释放，第二轮产能释放，所以现在就已经产能过剩。同时这个国家采取这种积极政策，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就是明年中小企业发展会少了，所以这是可持续问题。

第五个担忧是就业与失业问题。就业是各个国家的社会核心问题，劳动部门告诉我们09年1-3季度我国增加新增就业850万，但是没有数字显示1-9月份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但是通过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城镇登记失业只有从4.2%涨到4.3%。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09年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比上年增长增加了30%，就是说失业的问题产生一定的作用。

面对这五个担忧，政府应该更多要找一种平衡。政策需要平衡，从增长角度来说，只要持续下去就能够保证明年GDP增长不低于9.5%。我国的国家资源丰富，管理宏观能力比很多国家都强，只要政府政策判断上是正确的，去管理，去重视，成为政府的共识。我们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 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

有关。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如果1995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可以说上升到670左右，而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饼”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同时，这还忽略了在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当中，相当部分好处是集中在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以及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手里。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的纯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大。

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这一统计意味着，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

中国的社会财富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分配给民间的很少。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增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

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不管财富如何升值和经济如何快速发展，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回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这样长期靠投资基础建设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能维持下去？可以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 人才竞争

“千人计划” 还需吸纳人文学科高端人才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张旭东

“千人计划”是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对策，目前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又良好的影响。未来，中国如需继续完善“千人计划”，加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加强对人文学科高端人才的重视。目前，“千人计划”尚不包括文科（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高端人才，但中国的崛起和稳定，又十分需要这方面的创造性人才。

软实力建设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人文科学领域的“生产力”和“自主价值创新能力”，关系到国家乃至文明的自我守护能力、自信心和价值影响力，实乃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巨大国力，反过来凸显了我们在意义、想象、价值等精神领域的“守

势”和缺乏进取心。国内文科教育，尚未完全摆脱老化、僵硬、教条、闭关自守、千篇一律、在低水平上重复等体制性问题；同时，在市场化大潮中，又出现新的人心涣散、唯利是图、盲目扩招扩建、总体质量下滑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人学学科的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匮乏。同时，这还关系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和信念。没有人文领域的意义框架和价值创造，器物层面上创造的财富，无法带来人生的幸福和满足感，没有立足于知识的信念，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价值创造

人文学科衍生的产业同样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属于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知识经济，例如传媒、文化、电影、出版等狭义的人文学科产业与创意产业以及广告、公关、法律、咨询、教育等广义的人文学科产业，还包括一些知识服务产业。在美国，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投资和全球票房收入甚至可以相当于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值，人文学科一样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政府决策层应帮助各级政府确立人文科学同样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观念。

意义争夺

意义争夺，其实不只是文化输出的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得到全球各国与其人民认可，以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有关分析、理解中国的知识活动，都处在各种不同的全球性的意义框架和价值体系下。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影响下；都面临严峻的、激烈的“意义争夺”问题。而且，这一情况也不可能因为主观愿望而改变，“中国问题”不能关起门来研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中国影响世界，同时也只能在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空间里得到充分阐释，中国也才能获得与大国地位相当的全球影响力。

而海外文科高端人才，则有助于我们在中国问题和西方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的缓冲和斡旋地带，也有助于把当代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介绍给海外的舆论、学术界和文化界。而且，在海外的人文领域的高端中国人才，只要认同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能看到和理解中国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和潜力，加上他们同时在海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前沿的、高水准的日常工作，熟悉西方国情以及西方民众的受众心理，再与舆论媒体结合起来，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帮助塑造出中国的全球道德文化感召力。

政策开发

最近在人民网看到李源潮部长就干部选拔制度发表的一个谈话,其中谈到当前中国需要增强制度竞争方面的能力,深有同感。良好而符合国情的政策出台,关系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崛起。以中国目前发展的势头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参与度,仅有干部系统,尚不足以应对在文化、思想、价值等领域哪怕仅仅是政策开发领域的全面机遇和挑战。大学、研究所、思想库、媒体、基金会等应成为当代中国政策开发的新的力量。在“千人计划”内设立文科试点,可帮助国内主要大学和具有文化远见和抱负的地方政府,网罗和选用海外合适的高端人才,组织高端的高等研究所、智库,帮助中国决策的科学化、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以及进行储备性长远政策的研究,意义重大。

结语

文科领域人才遴选,缺乏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能够依据的公认的客观和量化的标准,因此需要从国内对研究重大问题的需要出发,以自己的目标、标准、价值观和判断为依据,积极主动地物色合适的人选。最近《纽约时报》提到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遇到的两个障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亲繁殖”、“武大郎开店”和“低水准、平庸化”,就说明目前中国特别需要“千人计划”这样国家牵头的高端平台,吸引高端的人文学科人才,为高标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文科学思维和训练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 社会改革

从“刀制”到“水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曙光

中国60年法律之治的变迁,实际上是围绕两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来展开的,一个是“法制”,(对应的英文是Rule By Law,)另一个是“法治”(对应的英文是Rule Of Law)。前者因为“制”是“刀”字旁,

而被称为“刀之制”，后者因为“治”是“水”字旁而被称为“水之治”。

新中国建国初期，痛恨于国民党政府吏治的无能与腐败，共产党新政府立志建立清明、开放的政治协商制度。因此，“五四”修宪以及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敌对分子成为新中国“法制”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时期“刀之制”演变成“无法无天”，取代“法制”的是随心所欲的“人治”，完全替代了有一定程序要求的“法制”。

“文革”以后，中国的新领导者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就迅速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批“刀把子”法律，为稳定局势与快速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从1980年始，“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成为一时之选。1983年，为严厉打击当时猖獗的刑事犯罪，最高法院把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至各省级法院。而“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则把人们对“法制”的期盼带到最高点。历史似乎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

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这一热门词汇的传播，作为“刀把子”的“法制”的局限性就愈来愈明显了，人们希望法律不仅仅意味着警察与监狱，更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治”于是应运而生，“水”字旁法治，其功能不仅仅是用来镇压、打击罪犯，而且其更重要的功能是用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约束政府行为与建构现代制度文明。

“水之治”是希望法律能在处理社会冲突与利益纠纷时能“一碗水端平”；希望“水银泻地”——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能实现全覆盖。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截至2009年3月，中国现行有效法律有231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7600多件。这二百件的法律当中80%以上是有关市场经济、依法行政和民生的立法。也就是说，中国有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的覆盖面非常广，对我国政治进步、整个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市场游戏规则的作用，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以重复的、有权威的预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法律的执行上、实施上还有很多问题，但客观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展。不过，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实际上还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面临着的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问题。现

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学，很多立法互相打架。比如，《物权法》出台了，但只有这部法律提“物权”，《宪法》、《公司法》没有提物权，其它市场经济法律很少提物权，都提的是财产。这使得法律的概念体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这是科学立法不够的问题。

民主立法也没有完全做到，很多立法还都是政府部门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体没有参与进来。比如涉及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不知道；涉及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参与不进来；涉及外资的，外资企业也参与不进来；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一般都参与不进来。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还较低。所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需要下一步制定出具体的参与规则来。

不仅要有立法上的推进，在公务员用法、依法行政方面也要进行推进。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检察机关等司法机构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监督方面取得推进。司法审判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体制”改革，最近几年开始在说司法改革，明确提出来要理顺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比如审判权、监督权的关系。

法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如法院体系能不能建立双层制的、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法院体系，双层级法院各司其职，以遏止司法不公与司法的地方保护现象。检察机关能不能够让它转为政府的诉讼机关。司法审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审法官制度，现在都是集体负责，实质是淡化个人责任。还比如实践中广泛流行的请示制度，现在好多具体案件动不动就下层法院跑到上一级法院去请示，上一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受理的案件给出一个具体的意见。这种请示制度最大的恶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诉权给剥夺了，也淡化了责任关系。

解决老百姓权利贫困的现象，则不应通过行政手段，而应该更多的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当社会出现非常复杂的情况时，它的稳定和秩序往往受到挑战。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一方面是世界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上，积累了一定的问题和矛盾，需要释放出来。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这将触及社会各方直接的利益，这样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实际上，法治应该转化为一种公平分配正义的技术，让老百姓共享正义的分配包括对改革成果的股份。

◆ 房地产问题

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症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因此愤怒的民众，也日渐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症结所在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的确，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搞寡头式垄断。同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也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另外一个就是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这样，无论哪个角色，地方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进而，如上面所说，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

各国的公共住房经验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的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供给的极度缺乏。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

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结语

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影响了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因此，中国必须对自身房地产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否则，难以促成这样的有效转型。

建议建设魅力青年廉租社区

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岳

关于房价的讨论现在很热烈，很多等待买房的年轻人为自己蜗居甚至蜗居机会也没有而郁闷。想买房而感到房价过高的是一大批80后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工作不久，按照正常的收入水平来说是买不起房的，但是现在他们有很强的住居需要，很多人朴素地希望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

不少人认为，80后就应该接受自己买不起房的现实，而接受租房或者选择廉租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大城市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占据了大多数，那种廉租房式照顾少部分弱势群体的照顾模式是行不通。

一是因为大多数与少数的区别，大城市大多数年轻人买房不起，这意味着只保证对少数群体供给的现行廉租房的供给远远不够，同时户口政策也把上千万在大城市有居住需求的外地青年排斥在外；其次，仅仅给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提供一处既不舒服、也没有适当服务、更在偏远处、连工作的交通都不方便的地方作为廉租场所，似乎很难说服大家去接受这类所谓的廉租房选择。

因此，建立一种年轻蓝白领们可承受与乐于进驻、上班方便、适合他们学习交往的社区模式和公共空间，此时显得尤为重要。这必须要发挥青年组织的优势，在建设年轻人需要的低成本年轻社区方面做一些工作。社区建设的成本可以低一些，大家租的房价也可以低一些，但从社区建筑风格、社区设施、社区青年服务、社区活动、社区交通都需要更加符合年轻人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尤其能照顾年轻人工作、社交、学习、娱乐的需要。

依照现在数量非常少的廉租房的形象与模式，个人认为它们在80后中间是吃不开的。相反，如果真有人在青年廉租社区的交通、设计、服务方面下很好的心思与功夫，建造出很好的服务品牌，这些社区的大受欢迎也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这些社区真的没有好的物业机构来管理，可以建立公益式的物业管理机构来服务，也可以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在这类社区中探索出新的有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来，也扩展了社会就业渠道。

廉租房社区在中国内地目前还没有太多现成的模式，有些开发区的青年工人宿舍区似乎就是类似的样式，但是如果廉租房社区变成了变相的贫民窟显然不可行。因此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政府投入、大规模的廉租管理机构管理、青年服务组织与社会工作组织介入服务这样的解决方式。我们一般性地讨论廉租社区已经有一定阶段了，目前是我们必须下决心进行一些成规模的社区实验与梳理解决方案的时候。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10年 7期

要 目

- | | |
|------|----------------------|
| 月度论坛 | CCG:“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 |
| | 黄亚生:印度崛起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
| 中国模式 |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
| | 黄 靖:中国模式正受到挑战 |
| 金融危机 | 陈兴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五大担忧 |
| 经济转型 | 陈志武: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
| 人才竞争 | 张旭东:千人计划需吸纳文科领域高端人才 |
| 社会改革 | 李曙光:从“刀制”到“水治” |
| 住房问题 | 郑永年: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症结 |
| | 袁 岳:建议建设魅力青年廉租社区 |

www.ccg.org.cn

电话:010—64392122、64392123、64398745 传真:010—64398744 邮箱: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10年7期

主办单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志凯 汤敏 陶庆华 田溯宁
王波明 薛澜

执行主编

邓宗南

编辑

苗绿 常慧敏 封涛

编务

王颖 冯登宁 孙娜娜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宏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兴动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邓峰 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宁 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首代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山 三山公司合伙人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小加 香港证券交易中心总裁
李一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林达贤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刘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王永庆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
宋永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管理司司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谭天星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司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主席,创办人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王文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周云帆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亚大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唯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易珉 GE公司环渤海区总经理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张亚勤 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民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月度论坛

CCG 主办“中印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

自日本于二战之后重新崛起以来，中国与印度又相继腾飞，“亚洲崛起”和“世界中心”的东移，正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大格局最大变化之一。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之间无论是国情还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历程，既有可以导致在许多领域内竞争与比较不可避免的相似性，也有导致两个国家展开合作以及走向不同发展前景的重要区别，加上绕不开目前又无法协商解决的领土争端问题。因此，“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比较，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仅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全球化世界，成为全球政、商、学各界的热门话题；同时也会深刻影响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发展，成为各自不得不重视的研究课题。

为更好探讨中印之间的关系，比较“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的长短异同，以便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获取更多借鉴，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在2010年1月21日于长安俱乐部举办了“大国崛起的龙象之争：中印的竞争与合作”午餐会。午餐会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主持，并邀请国际知名的相关研究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担任主讲嘉宾。

其他出席人员包括：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陶庆华，SOHO中国CEO张欣，华平投资董事总经理孙强华，万国集团董事长孙立哲，北大MBA美方院长杨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方源资本总裁唐葵，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中化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李雷，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Hay(合益)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陈玮，磊石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黄伟东，北京绿创环保集团董事局主席姜鹏明，渔阳饭店总经理蒋大北，中国专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田义，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副总裁赵玉峰，达美航空中国区总经理Sandeep Bahl，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副代表邵丽，中国联合电力投资公司执行董事Eri Zhu，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处政策分析官员Jonathan Fritz，无限广告执行总裁徐大庆，亨瑞国际咨询公司总裁Henry Zou，西安方元市场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庄元，IDC中国研究总监武连峰，北京国际汉语学院副院长

李劲松，King Hong Capital董事总经理曾人雄，万富春森林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CEO程受珩，香港交易所北京代表处副代表邵丽，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集团产品总监邓适宜等70多位各界人士。

黄亚生教授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华裔学者之一，先后于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世界银行顾问，目前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同时也是复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和湖南大学荣誉教授，其最新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2008年度最佳图书之一。他也是研究中国与印度的著名专家，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以便帮助中国与印度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黄亚生教授指出，很多人去印度，眼睛里常能看到的是脏乱差的印度，就觉得印度落后于中国，但这只是看到了硬件设施和基础建设，而没有看到“软件”因素，包括各种经济指标、政府与企业管理、金融体制等眼睛看不到的竞争力。例如印度经济发展依靠内需为主要驱动力，非常稳健，第三产业也很发达，而这正是现在中国经济转型所致力方向之一。因此，尽管中印各自的发展模式并无高下之分，但“印度模式”中也有许多为中国未来发展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黄亚生教授引用巴西过去的案例总结称，从1968年到1976年，巴西也有奇迹性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1%。但是，经济效率与政治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在经济增长得到妥善的解决，结果接下来就出现了20年的停滞不前，十几年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说明这个模式能够长期可持续地成功。“中国模式”已经在过去三十年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进行修正。印度的崛起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也指出，作为本世纪逐步走向“崛起”的两个未来的大国，印度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人口最多，经济总量大，人均收入低，经济快速增长，财富收入两极分化严重；同时也是世界上送出留学生最多、接受海外汇款最多、人才流失数量庞大的两个国家，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企业家成为了美国硅谷的重要力量。但是，中国与印度也有着许多不同，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政府极富效率并且政治稳定。但是，尽管大多数

舆论包括他自己都更为看好“中国龙”，这也不意味着“印度象”没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王辉耀主任总结“印度模式”对中国的启示称：其一，虽然印度每年引进的外资远远不如中国，但印度依靠内需为驱动的经济发展更为稳健，而不易受外界影响，同时与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来刺激经济的模式，印度更重视经济体制包括金融的改革以及发展教育等社会因素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这对现今中国经济是个启示；其二，印度在高新产业的发展更注重知识与技术创新，这对中国欲从“山寨”跟风型的知识经济转型成为注重创新、创意的“中国创造”型经济也有借鉴意义；其三，在低端产业发展上，印度对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非常成功，这又归功于印度政府“国退民进”的放松管制以及鼓励私有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其四，印度重视社会投资的战略也值得中国学习，例如尽管“人多地少”、“人均收入低”的情况比中国更严重，但印度却能够给全民提供免费医疗，这并不是对财富二次分配全体国民采取平均主义，而是能者多得，同时也注意完善社会保障保证社会和谐；其五，印度对于人才的重视也值得参考，例如为了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回国效力，印度2003年就改变国策开放双重国籍，并允许海外出生的印度裔申请。

此次午餐会为国内许多媒体所关注，《中国海归》主编陈海，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部门主任袁铁成，《中国经济周刊》主笔叶建国，《中国日报》记者司婷婷等媒体人士也参加了此次午餐会。这也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自去年举办“新加坡人才战略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千人计划建言献策”、“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等研讨会以及“国家形象论坛”以来，在2010年新年举办的第一次高端学术论坛。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还将于2月8日在长安俱乐部举办“内容为王，品牌为皇——中国媒体前景”午餐会，目前已确定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专门负责大中国区媒体及互联网行业投资推荐的季卫东先生担任主讲嘉宾。季卫东先生曾在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和格林威治(Greenwich)媒体研究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获有iResearch“新经济最佳投资银行分析师”的称号，并被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和香港《南华早报》评为亚洲软件与服务产业第一的选股专家。目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已经成为国

内有关人才、留学、海归创业等研究方面的领先者，也是中国新兴而著名的全球化研究智库，其举办的高端论坛和圆桌研讨会已在国内外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

印度崛起对中国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黄亚生

虽然，“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则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留在手里。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能长期持续，而且是有利于人民福利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微观的条件，有各个方面，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有政府管理的质量、政府自己受不受监督以及有没有节制等，这些都是微观方面的条件，也就是说制度方面的条件。在我看来，中印之间的比较，中国在哪一个方面都比印度强，除了经济体制；印度在哪一个方面都比中国差，除了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取决于制度条件

一般谈印度问题，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是它的劣势。很多国内记者也有谈到，一去印度就觉得又脏又差。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差的硬件环境，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现在能达到8%呢？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印度肯定在某些方面做得不错。印度的劣势是很容易用眼睛看到，而它的优势是非常不容易看到的，它是一种隐性、无形的东西。虽然80年代去印度和现在去印度，从表面上来看没有那么大的区别，高速公路还是很差，等等。但是如果真正了解印度的经济变革，就会发现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可能取决于很多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取决于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管理、政府的管理等等这些不容易量化的“软件”。或者说，经济起飞取决于这个国家有良好的软

件设施。

中国目前的措施是应对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要建更多的铁路、公路。而在在我看来，应该是先提高教育等软件设施的建设。先有软件设施方面优越的条件，才有经济发展的质量，有了经济发展和资源才去建设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没有高速公路，是这个国家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印度的金融优势很大

印度经济的最大优势是金融优势。印度的发展跟中国的路径很不一样，印度1991年的经济改革是外部推动的，当时发生的卢比危机，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金融危机。当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介入，要求印度进行金融改革，印度的步伐非常快，1992年已经开始银行的私有化了。很多人总是讲印度对外资限制，而中国对外资开放，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印度同时对内资开放，也对外资开放，而中国只对外资开放，对内资不开放，中国和印度的主要区别在内资政策方面。

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于印度10多年，而中国的金融改革却晚于印度10多年。印度的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同时启动，而中国是经济改革在前、金融改革滞后。中国和印度各有领先的地方。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中国就业自由程度要超过印度。从员工的报酬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也优于印度。但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对于员工的培训，中国落后于印度；对于市场营销重视的程度，中国也落后于印度。

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

印度获得的外资相当于中国获得外资的10%，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外资在行业分布方面有巨大的不同。在中国，任何行业都有外资。外资的存在取决于本土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外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比较。如果本土企业非常具有竞争能力，那么本土企业应该输出资本，而不是进口资本。

而在印度，虽然获得的外资相当于中国的10%，但是每一分钱的外资都在高科技企业。通用电器在上海有一个研发部门，在印度也有一个研发部门，但在印度的研发部门在规模、运行等方面远远超过上海的研发部门。也就是说，印度的外资可能进入得少，但从行业分布来说是分布在相对劣势的高科技部门。印度在高科技方面虽然比较发达，但相对于美国企业、欧洲企业还是有劣势，所以该在这些方面吸收外资。

这说明，外资进入中国不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一种金融现象。中国

外资行业分布普遍，是金融失败的表现。如果银行体制更有效率，使我们自身能够获得资金，就不需要引进股本资金来发展生产了，股本资金是非常昂贵的资金，特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每年8%、9%这么高的速度时，通过股本资金来融资是非常昂贵，贷款资金比较便宜。在经济发展这么快的时候，当民营企业不能获得贷款资金而选择引进外来股本资金筹资，这可能就是金融体制出现了问题。

◆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辉耀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许多研究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研究，是必然的。当然，泛指“中国模式”还不只是经济模式，还可以细化为中国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中国模式”非常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政府主导型经济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

的经济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自动削弱了“看不见的手”。长期形成了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首先，国有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放贷可能产生坏账；其次，铁路、公路、基建等号称“铁公基”的基础设施已经日益过度，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此外，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趋势有所抬头，这样长期下来如何形成“内需经济”？实际上，中国经济过去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开放了民营经济，这也是中国模式能否取得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政府力量过于强大，市场的力量会被限制，就会激发不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产业的商业模式……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也只是超级市场背后的工厂；中国第三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0%；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资源垄断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纯粹的民营企业上榜。中国还经常用“搞运动”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市场本能的创新活力无法充分激发，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遍及全世界的“中国制造”是相对低端的产品，没有“中国创造”的名牌，中国成为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而这种低成本加工国的地位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在不断减弱。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三十年来，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国面临是十年后“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因为“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另外，随着普通劳动者工资和收入相对全球增长的快速上涨，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也会逐渐减弱。“人口红利”曾帮助“中国模式”完成了低端的发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未来会给“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

应该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打造创新型国家，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最核心的生产力已经不是工厂、设备、土地、以及能源，而是人才。我不久前出版《人才战争》一书，就指出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能否真正拥有大批高层次人才，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保证“中国模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

民众心理问题

理论上，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比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导的社会更偏重效率

与公平。但前些年，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出台的许多政策都体现了效率优先的特性。本来，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也是重企业和资本、轻个人和劳动。因此，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上继续偏重效率，那么，无疑会加重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向前者倾斜。再加上社会正义、教育、医疗、住房等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这就会有国富民弱、内需无法增强、不得不依赖外需、处在产业链低端等系列恶性循环。另外，近年来因为腐败蔓延加深等问题，“民”对“官”缺乏信任感，而这在网络时代尤其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不可否认是现有的“中国模式”所需要克服的另一面。

中国社会在取得物质的保障后，必将迎来多元化的精神需求时代。过去的“中国模式”专注于集中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经济目标，个体在其中显得微不足道也易被忽视。在克服物质匮乏，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之后，“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将是如何分享物质。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的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入将是“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环境和能源问题

多年以来，“中国模式”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环境承受能力达到极限，单位GDP能源消耗巨大的粗放式经营难以为继。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在2025年要达到减排40%-45%的标准，认真实施起来，对现有粗放式经营模式将会是巨大的挑战。

结语

综上所述，可见现有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过去三十年经济奇迹，却是一种处在比较低端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进程中会十分有效。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模式需要做新的提升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包括进行社会 and 政策的创新。过去“中国模式”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不断地融入“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等在内的全人类好的经验和智慧，以积极、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那么，未来中国经济或社会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依然必须学习“普世经验”和“普世价值观”。反之，要想让“中国模式”被世界认同和得到推广，也就是说自身能具有普世性，更必须不断开放和融合。

中国模式受到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靖

中国模式的存在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现实,但在当今困局下断定中国模式的优势,似乎为时太早。而认为中国这次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比较小,也是不确切的。

首先,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条件有变化。中国经济上的成功,相当程度借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或者称东亚模式——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高速发展。因此,源源不断的外资投入和开放繁荣的外部市场,是东亚发展模式得以成功的两个必要的外部条件。就中国而言,对外出口虽然占GDP比例不大,但外资的不断涌入、外贸相关产业的发展,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这两个外部条件都受到很大打击。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看来还是成功的。但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现在还很难判断。所以,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挑战依然十分严峻。

第二,中国累积了很多外汇储备。原本几十年发展经济而积累的财富,如今却变成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这导致中国整体经济危险度很高,更容易受到自己很难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潜在损失。

第三,目前经济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及其配套措施。比如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很落后,经济结构也不合理,投资推动所占GDP的比例过大,而且一直不断提高。2001年,这个比例突破35%,2007年为55.6%,去年高达57.3%。投资比例过大至少造成两个严重问题,首先产能过剩,其次是就业长期停滞不前。虽然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但中国“实质就业市场”发展十分缓慢,有社会保障和发展前途的就业机会增长不到1%。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但在社保、户口等却享受歧视性的“非正常国民待遇”;大学生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

并且,一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到经济发达阶段的根本衡量指标是第三产业即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后的20多年里,都不同程度地将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提高到45%以上。中国经过30

年，比例现在才勉强达到40%。而中国第二产业一直比重过大，目前仍然高达50%。两高一低(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它不仅给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而且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硬伤。不过，虽然中国模式的弱点和硬伤都很明显，但整个中国经济实体还是很强大。实体经济的抗压性比较大，恢复的基础强、速度快。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而有力，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保留对这些产业的垄断和控制，是一种发展的阻碍和桎梏。但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反而变成了控制局面的优势。

但是，经历金融危机后，对于是否要保持甚至加大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我本人持否定的观点。国家干预应该集中在民生、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投资领域，对于市场经济则恰恰是要抓住危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知道，推动经济的两个动力是竞争和创新。竞争的公平、合理、透明，是激励发明和创新的基础。然而，垄断经营不仅大大破坏了这两个动力，而且导致分配不公平、以至社会的不公平。实际上，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现象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例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今年来解决了近70%的就业问题，而这与他们获得国家银行贷款的比例极其不匹配。

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瓶颈是分配问题。从邓小平到江泽民，首要目标是创造财富——“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了这一代领导人，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他们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分配问题，以此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比如富人开车把普通老百姓撞死，会导致如此之大的社会不满，原因并不是老百姓仇富，而是人们对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到了忍耐的极限。中国的发展模式到了临界点，如果不突破，未来的路会很难走。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制度改革完成民主转型，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因为创造财富往往不需要政治改革，但分配财富必定需要政治改革。所以说，这一代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担子要重得多。

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公平是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因此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这点出了中国发展的的问题所在，但要取得更好的实施效果需要进一步努力。根

源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被许多强势团体所挟持。因此，中国需要进行系列的改革，例如完善民主社会，发展公民社会，增加非政府组织尤其能进行政策开发的智库的数量和质量，等等。尤其政策制定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必要的保证。当然，有些事情已经在政府主导下开始。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政府决策的更加科学化与民主化，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中国的大城市，人们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是逐渐增加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会有反复甚至倒退，但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的政治民主与完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金融危机

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五大担忧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兴动

当前，从宏观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在加速。很多人把这次经济增长归功于这次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前的经济增长基础不牢，相关部分是宏观政策拉动的，要保持它的可持续性还需要调动民间经济的增长。而且由于没有及时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一轮经济增长中已经出现拐点，许多政策没有预见性，没有领先性，导致很被动。从现在来看，宏观刺激政策应该是过量的。当然，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球都没有对这个形势做出一个客观和正确、符合实际的一种判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工业化远远没有完成，城市化还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所以，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尽可能大的推动城市发展，推动服务业发展。但从短期来看，现在出台的政策有大概五个方面的担忧：

第一个担忧是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是全球性的，比如美国、欧洲，作为一个指标性的含义，增加了20个基点，但是未来要增长多少，因为利率往下降了，往上提多少，现在还说不出它已经从紧了。但是从G7国家来看，为时还太早，未来两三年可能都退不出，这个是外部因素，外

部因素导致全球流动性非常充裕，中国流动性更是充裕，所以现在应该管理流动性。

第二个担忧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货币多，一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中国目前则还是处在通缩的状态，如果通货膨胀管不好，它可能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不一定是CPI，可能表现在比如资产泡沫。

第三个担忧是银行不良贷款和坏账。

第四个担忧是可能会出现结构恶化。现在已经开始投资的，除了基础设施以外，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还是在26%、27%以上。通过一两年以后，又可能出现产能释放，第二轮产能释放，所以现在就已经产能过剩。同时这个国家采取这种积极政策，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就是明年中小企业发展会少了，所以这是可持续问题。

第五个担忧是就业与失业问题。就业是各个国家的社会核心问题，劳动部门告诉我们09年1-3季度我国增加新增就业850万，但是没有数字显示1-9月份有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但是通过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城镇登记失业只有从4.2%涨到4.3%。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09年失业保险金的支付比上一年增加了30%，就是说失业的问题产生一定的作用。

面对这五个担忧，政府应该更多要找一种平衡。政策需要平衡，从增长角度来说，只要持续下去就能够保证明年GDP增长不低于9.5%。我国的国家资源丰富，管理宏观能力比很多国家都强，只要政府政策判断上是正确的，去管理，去重视，成为政府的共识。我们就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 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需改变“收入比”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中国的经济转型为什么难？在我看来，与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收入比过大

有关。如果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如果1995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基数是100，到2007年的时候可以说上升到670左右，而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饼”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同时，这还忽略了在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当中，相当部分好处是集中在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以及垄断性国有企业职工手里。

国家收入相当于多少“居民收入”？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的纯收入。比较一下，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大。

到2006年年底，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这一统计意味着，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

中国的社会财富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分配给民间的很少。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增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

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不管是前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工业。因为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

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

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不管财富如何升值和经济如何快速发展，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回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现在这样长期靠投资基础建设和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怎么能维持下去？可以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 人才竞争

“千人计划” 还需吸纳人文学科高端人才

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张旭东

“千人计划”是中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应对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对策，目前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又良好的影响。未来，中国如需继续完善“千人计划”，加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加强对人文学科高端人才的重视。目前，“千人计划”尚不包括文科（特别是人文科学）的高端人才，但中国的崛起和稳定，又十分需要这方面的创造性人才。

软实力建设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人文科学领域的“生产力”和“自主价值创新能力”，关系到国家乃至文明的自我守护能力、自信心和价值影响力，实乃国际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巨大国力，反过来凸显了我们在意义、想象、价值等精神领域的“守

势”和缺乏进取心。国内文科教育，尚未完全摆脱老化、僵硬、教条、闭关自守、千篇一律、在低水平上重复等体制性问题；同时，在市场化大潮中，又出现新的人心涣散、唯利是图、盲目扩招扩建、总体质量下滑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人文学科的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匮乏。同时，这还关系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和信念。没有人文领域的意义框架和价值创造，器物层面上创造的财富，无法带来人生的幸福和满足感，没有立足于知识的信念，当代中国的生产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价值创造

人文学科衍生的产业同样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属于典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的知识经济，例如传媒、文化、电影、出版等狭义的人文学科产业与创意产业以及广告、公关、法律、咨询、教育等广义的人文学科产业，还包括一些知识服务产业。在美国，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投资和全球票房收入甚至可以相当于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值，人文学科一样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政府决策层应帮助各级政府确立人文科学同样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观念。

意义争夺

意义争夺，其实不只是文化输出的问题，还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得到全球各国与其人民认可，以及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有关分析、理解中国的知识活动，都处在各种不同的全球性的意义框架和价值体系下。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影响下；都面临严峻的、激烈的“意义争夺”问题。而且，这一情况也不可能因为主观愿望而改变，“中国问题”不能关起门来研究，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中国影响世界，同时也只能在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空间里得到充分阐释，中国也才能获得与大国地位相当的全球影响力。

而海外文科高端人才，则有助于我们在中国问题和西方解释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的缓冲和斡旋地带，也有助于把当代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介绍给海外的舆论、学术界和文化界。而且，在海外的人文领域的高端中国人才，只要认同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能看到和理解中国现有制度的合理性和潜力，加上他们同时在海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前沿的、高水准的日常工作，熟悉西方国情以及西方民众的受众心理，再与舆论媒体结合起来，将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帮助塑造出中国的全球道德文化感召力。

政策开发

最近在人民网看到李源潮部长就干部选拔制度发表的一个谈话,其中谈到当前中国需要增强制度竞争方面的能力,深有同感。良好而符合国情的政策出台,关系整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与崛起。以中国目前发展的势头和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参与度,仅有干部系统,尚不足以应对在文化、思想、价值等领域哪怕仅仅是政策开发领域的全面机遇和挑战。大学、研究所、思想库、媒体、基金会等应成为当代中国政策开发的新的力量。在“千人计划”内设立文科试点,可帮助国内主要大学和有文化远见和抱负的地方政府,网罗和选用海外合适的高端人才,组织高端的高等研究所、智库,帮助中国决策的科学化、社会公共政策的完善以及进行储备性长远政策的研究,意义重大。

结语

文科领域人才遴选,缺乏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能够依据的公认的客观和量化的标准,因此需要从国内对研究重大问题的需要出发,以自己的目标、标准、价值观和判断为依据,积极主动地物色合适的人选。最近《纽约时报》提到中国海外留学生回国效力遇到的两个障碍——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亲繁殖”、“武大郎开店”和“低水准、平庸化”,就说明目前中国特别需要“千人计划”这样国家牵头的高端平台,吸引高端的人文学科人才,为高标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文科学思维和训练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 社会改革

从“刀制”到“水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曙光

中国60年法律之治的变迁,实际上是围绕两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来展开的,一个是“法制”,(对应的英文是Rule By Law,)另一个是“法治”(对应的英文是Rule Of Law)。前者因为“制”是“刀”字旁,

而被称为“刀之制”，后者因为“治”是“水”字旁而被称为“水之治”。

新中国建国初期，痛恨于国民党政府吏治的无能与腐败，共产党新政府立志建立清明、开放的政治协商制度。因此，“五四”修宪以及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敌对分子成为新中国“法制”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时期“刀之制”演变成“无法无天”，取代“法制”的是随心所欲的“人治”，完全替代了有一定程序要求的“法制”。

“文革”以后，中国的新领导者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就迅速颁布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批“刀把子”法律，为稳定局势与快速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从1980年始，“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成为一时之选。1983年，为严厉打击当时猖獗的刑事犯罪，最高法院把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至各省级法院。而“人治与法治”的讨论则把人们对“法制”的期盼带到最高点。历史似乎画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

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这一热门词汇的传播，作为“刀把子”的“法制”的局限性就愈来愈明显了，人们希望法律不仅仅意味着警察与监狱，更应该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法治”于是应运而生，“水”字旁法治，其功能不仅仅是用来镇压、打击罪犯，而且其更重要的功能是用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与社会秩序，约束政府行为与建构现代制度文明。

“水之治”是希望法律能在处理社会冲突与利益纠纷时能“一碗水端平”；希望“水银泻地”——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能实现全覆盖。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截至2009年3月，中国现行有效法律有231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7600多件。这二百件的法律当中80%以上是有关市场经济、依法行政和民生的立法。也就是说，中国有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的覆盖面非常广，对我国政治进步、整个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市场游戏规则的作用，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可以重复的、有权威的预期。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法律的执行上、实施上还有很多问题，但客观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进展。不过，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实际上还面临很多问题。

首先面临着的是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问题。现

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学，很多立法互相打架。比如，《物权法》出台了，但只有这部法律提“物权”，《宪法》、《公司法》没有提物权，其它市场经济法律很少提物权，都提的是财产。这使得法律的概念体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这是科学立法不够的问题。

民主立法也没有完全做到，很多立法还都是政府部门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体没有参与进来。比如涉及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不知道；涉及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参与不进来；涉及外资的，外资企业也参与不进来；涉及其他市场主体的，一般都参与不进来。立法的公众参与度还较低。所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需要下一步制定出具体的参与规则来。

不仅要有立法上的推进，在公务员用法、依法行政方面也要进行推进。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检察机关等司法机构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监督方面取得推进。司法审判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体制”改革，最近几年开始在说司法改革，明确提出来要理顺法院、检察院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比如审判权、监督权的关系。

法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如法院体系能不能建立双层制的、国家层级和地方层级的法院体系，双层级法院各司其职，以遏止司法不公与司法的地方保护现象。检察机关能不能够让它转为政府的诉讼机关。司法审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审法官制度，现在都是集体负责，实质是淡化个人责任。还比如实践中广泛流行的请示制度，现在好多具体案件动不动就下层法院跑到上一级法院去请示，上一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受理的案件给出一个具体的意见。这种请示制度最大的恶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诉权给剥夺了，也淡化了责任关系。

解决老百姓权利贫困的现象，则不应通过行政手段，而应该更多的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当社会出现非常复杂的情况时，它的稳定和秩序往往受到挑战。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一方面是世界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上，积累了一定的问题和矛盾，需要释放出来。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发展，这将触及社会各方直接的利益，这样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实际上，法治应该转化为一种公平分配正义的技术，让老百姓共享正义的分配包括对改革成果的股份。

◆ 房地产问题

中国住房问题的政策症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政府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因为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而被变相地剥夺了“住房”权因此愤怒的民众，也日渐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隐患。

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房地产已经占了GDP的6%，四分之一的投资在房地产行业，50多个产业与房地产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有关当局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走出过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多年来，尽管有关当局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与泡沫和空置房平行存在的现实是，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最新调查）。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社会对房地产业现状，以及对政府无能改变这种局面的不满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沸点。

症结所在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很多人往深一步，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指向政府的责任。的确，就土地而言，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政府行政限制土地的供应量，政府搞寡头式垄断。同时，各级政府的卖地财政也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另外一个就是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笔者看，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在中国，房地产被视为仅仅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这样，无论哪个角色，地方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正因为这样，在中国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进而，如上面所说，房地产也绑架着中国经济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动力真正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尽管它们也面临社会的压力。

各国的公共住房经验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恶化这个局面，使得人们对房产价格的上升的预期牢不可破。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供给的极度缺乏。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

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对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结语

就房地产而言，中国政府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影响了中国社会稳定与和谐。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最严峻的是，尽管这样的压力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过，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解决房地产问题的动力和制度机制。因此，中国必须对自身房地产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否则，难以促成这样的有效转型。

建议建设魅力青年廉租社区

零点咨询集团董事长 袁岳

关于房价的讨论现在很热烈，很多等待买房的年轻人为自己蜗居甚至蜗居机会也没有而郁闷。想买房而感到房价过高的是一大批80后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工作不久，按照正常的收入水平来说是买不起房的，但是现在他们有很强的住居需要，很多人朴素地希望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

不少人认为，80后就应该接受自己买不起房的现实，而接受租房或者选择廉租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大城市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占据了大多数，那种廉租房式照顾少部分弱势群体的照顾模式是行不通。

一是因为大多数与少数的区别，大城市大多数年轻人买房不起，这意味着只保证对少数群体供给的现行廉租房的供给远远不够，同时户口政策也把上千万在大城市有居住需求的外地青年排斥在外；其次，仅仅给买不起房的年轻人提供一处既不舒服、也没有适当服务、更在偏远处、连工作的交通都不方便的地方作为廉租场所，似乎很难说服大家去接受这类所谓的廉租房选择。

因此，建立一种年轻蓝白领们可承受与乐于进驻、上班方便、适合他们学习交往的社区模式和公共空间，此时显得尤为重要。这必须要发挥青年组织的优势，在建设年轻人需要的低成本年轻社区方面做一些工作。社区建设的成本可以低一些，大家租的房价也可以低一些，但从社区建筑风格、社区设施、社区青年服务、社区活动、社区交通都需要更加符合年轻人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尤其能照顾年轻人工作、社交、学习、娱乐的需要。

依照现在数量非常少的廉租房的形象与模式，个人认为它们在80后中间是吃不开的。相反，如果真有人在青年廉租社区的交通、设计、服务方面下很好的心思与功夫，建造出很好的服务品牌，这些社区的大受欢迎也将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这些社区真的没有好的物业机构来管理，可以建立公益式的物业管理机构来服务，也可以鼓励社会工作机构在这类社区中探索出新的有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来，也扩展了社会就业渠道。

廉租房社区在中国内地目前还没有太多现成的模式，有些开发区的青年工人宿舍区似乎就是类似的样式，但是如果廉租房社区变成了变相的贫民窟显然不可行。因此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政府投入、大规模的廉租管理机构管理、青年服务组织与社会工作组织介入服务这样的解决方式。我们一般性地讨论廉租社区已经有一定阶段了，目前是我们必须下决心进行一些成规模的社区实验与梳理解决方案的时候。